



广州穆斯林报刊资料辑录

ديوان المصادر المعلوماتية من مجلات وجراندالمسلمين بقوانغ تشو في زمن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وطنية

(1928 — 1949)

马 强 主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创办有七种刊物，其资料价值弥足珍贵，迄今尚无人做过专门研究。本辑录收入的文章，主要以反映当时广州穆斯林社会生活状况为主。除对广州穆斯林所办刊物中的文章做了重点梳理外，作者还查阅了散见于其它相关刊物中的资料，是研究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的第一手文本。

ديوان المصادر المعلوماتية من مجلات وجراند المسلمين بقوانغ تشو في زمن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وطنية

موجز المضامين

وفي زمن جمهورية الصين الوطنية، كانت المجلات والجراند التي صدرت بواسطة المسلمين بقوانغ تشو تصل إلى سبعة أنواع، و تعد مصادر ها المعلوماتية ثمينة ونادرة جدا، وحتى الآن ما من احد تناولها ببحث علمي متخصص وبين يديك. هذا الكتاب وهو جامع مقالات من تلك المجلات والجراند، والتي تعكس احوال المسلمين المعيش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بمنطقة قوانغ تشو في ذلك الوقت. وبالإضافة إلى تدقيق المقالات المهمة التي نشرت بقوانغ تشو، قد راجع صاحب الكتاب بعض المصادر المتناثرة التي تقرأ من اخواتها المجلات. وبلا شك إنها من اول المصادر المعلوماتية التي تبحث بها في احوال المسلمين بقوانغ تشو في تلك الحقبة من الزمن.

Compile of Guangzhou Muslim's Documents
Published o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n the Republican China

ABSTRACT

There had been seven Muslim journals and newspapers issued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Republican China. Many articles in those publications provide with us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cial life of Muslims, which can be greatly beneficial for the research today we are going to undertake. No one has done any detailed study on the related articles so far. All the articles compiled in this book mainly concern about the social lives of Muslims in Guangzhou city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editor of this book tries to cover the contents of the articles in the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materials and documents. It is beyond doubt that these articles are the first-hand data and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Guangzhou Muslim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凡 例

一、为保存文本原貌,本次辑录选编的文章一般在文字上不做大的改动。如“底”不改为“的”,“智识”不改为“知识”,“阿洪”“阿衡”“亚洪”等一概不通用现在的“阿訇”一词等。但对明显的错别字进行了纠正,如“辈面”改为“背面”等。有些字词存在着多种写法,如那么、那末、那没等,核校时一律尊重原文照录。

二、由于有些文章没有标点,有些标点与现在的阅读习惯不符,照录原文恐造成参阅不便,因而辑录时进行了点校,如对书刊名一律不用原文的“『』”,而用“《》”,文中的引文符号也改为现在的引号。同时还使用了顿号。

三、文章出处刊物中的页码或版次,均用“第×页”或“第×版”标明,有些刊物如《天方学理月刊》既有标页数又有标版次者,一律尊重原文照录。

四、对文章中认为错误或缺失的词句,点校时予以纠正或补全,注明(案:疑作×字)或(案:应作×字)等。对存疑但无法确认的字词,一律用(?)标出,文中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也加注了案语,并用括号标记。

五、有些刊物的出版时间没有明确标明,如《穆士林》第一刊,经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查得标记为1930年9月,故采用此说。

六、原文中模糊不辨的字,均以“□”标明字数。

书写历史与文人良知

——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创办刊物回顾

（代前言）

五四运动以来,各地回族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创办了许多报刊杂志,据有关资料统计,各种刊物不下 100 余种。^①地处祖国南部沿海的窗口城市广州也不甘落后,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努力下,为后人留下了几种十分珍贵的资料。这些文本从不同角度论及广东的伊斯兰教状况和穆斯林的社会生活,是研究民国时期整个广东乃至香港、澳门等地穆斯林活动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由于资料难以掌握齐全,学术界同仁很少述及,缺乏对这些文献的介绍和研究分析。经过一年多的搜集,本人基本掌握了这部分资料的概貌,现就其大略分述如下。

一、文本简况

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所办刊物共有七种,大多创办于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有些停刊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只有《怀圣》创办时间较晚,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对于这些刊物,《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中有简要介绍。现仅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所藏和本人从香港等地搜集到的文本作出分述。根据网络联合目录查询,还有些本子散见于国家图书馆文献部、北京大学图书馆

^①邱树森:《回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281-290 页。该书收录的报刊目录,经统计为 140 种。

等地,具体在介绍单个文本时我都交代了查询结果,由于还有很多大学和省、市社会科学院没有加入图书馆的联合目录,对于古籍资料的检索依然靠手工,无法查到这些地方的收藏情况,所以目前只能得出初步结论,这些资料在中山图书馆文献部所藏最为齐全。

1. 《天方学理月刊》

月刊。创办于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由广州濠畔街回教礼拜堂《天方学理月刊》社主办,是时任濠畔寺教长的马瑞图同周善之、陈焕文等人创办的文化宣传刊物,主编马瑞图。开辟有论坛、译丛、译海新潮、杂俎、革俗、特载、问答、鸟瞰、小评、论著、逻辑、笔记、常识顾问、中外新闻、回教青年、文艺、小说、零金碎玉、教理测验等栏目,是民国时期广州创办最早的刊物。主笔者有马瑞图(玉龙)、杨瑞生、陈焕文、马得康、吴事勤、山国庆、易司马仪等,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广州陷落前,是在全国穆斯林报刊中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共出六卷,现中山图书馆文献部藏有第八、九、十、十一、十五、二十、二周年纪念号、三卷三号、四卷七号、八号。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标识如下:No.1[1928]-No.24(民国19年12月[1930,12]) v.3, No.1(民国20年1月[1931,1])-v.6, No.12(民国24年12月[1935,12]) No.73(民国25年1月[1936,1])-No.74(民国25年3月[1936,3])。

2. 《穆斯林》

期刊。该刊1930年9月初创于香港,代理发行处为香港下环湾仔道陈东里中华回教博爱社,承印者广州市西湖街岐兴阁,第三刊时编辑兼发刊者为广东《穆斯林》书报社,中华回教博爱社成为代理处,在广州市西门长庚路宁家里湖洞新巷第一号设有代派处。后来到第七期才由中华回教博爱社《穆斯林》刊社编辑发行,广州市小北湛家二巷六号《穆民》月报编辑部代订。因而本刊早期也可视为是广州穆斯林参与创办的刊物,其实后来的主办者也

主要是广东旅居香港的穆斯林,他们经常来往于粤港之间,原籍大多都是广东人,刊物早期内容也主要涉及粤港穆斯林事务,且以广州较多。主要开辟有论坛、译丛、要闻、宗教、布告、翻译、文海、鸟瞰、特载、言论、教义、事件、社务、来函照录等栏目,其中第十一期除正式栏目外还收编了《护教汇闻》,详细辑录了《南华文艺》等报刊刊载的侮辱伊斯兰教的文章,并附有英文翻译提要,对这一事件的始由叙述得很清楚,内容涉及教案、电报、信箱、日记、社论等,并对教案提及的侮辱性言词进行了批驳和反击。该社主要成员及主笔者有马敬之、马受百、马慎康、杨一飞、白珩、马达吾(野谷)等人,这些人后来成为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的主要创办人和奠基者。《穆民》和《天方学理月刊》的作者也经常投稿。该刊是研究香港穆斯林及其与广州等地穆斯林关系的珍贵资料。中山图书馆文献部藏有三、四、五六合刊、七、八九合刊、十一期。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1-6期。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第二期。

3. 《穆民》

月刊。民国二十年(1931)元月创刊于广州小东营回教礼拜堂《穆民》月报社。主编陈焕文,编辑通讯处在广州小北湛家二巷六号。开辟有穆民言论、翻译经典、穆民文艺、天方故事、东鳞西爪、穆民消息、教义研究、穆民金玉、医学常识、统计调查等栏目。该刊第一卷第二期为贵月号,专门介绍并讨论穆斯林斋月的宗教礼仪和活动;第一卷第八、九期为婚丧专号,专门介绍了婚姻和丧葬方面的有关知识。主笔人主要有山国庆、吴事勤、陈应琨、白珩、杨瑞生、易司马仪、野谷、马之驥、纳子嘉(纳忠)等人。本刊的前身就是《天方学理月刊》,其内容和风格基本保持一致,作者群大致也一样。中山图书馆文献部藏有第一卷第二期(贵月号)、第四期、第七期、第八九期合刊(婚丧专号)、十期。

4. 《塔光》

期刊。创刊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二十五日,^①筹备人为张耀汉、杨汉光、马志鹏、杨孔德、马兴亮,邀请著名文人李健儿作序。社址在光塔街五十六号清真小学内,初期分为四个栏目:教义、论坛、文艺、消息,后来又增加了论著、特载、杂俎、编后语等栏目,撰稿人除马瑞图、周善之、杨瑞生等人外,其余均采用笔名,有幽莲、亮公、宝塔、巍峨、凌云、怀圣、塔影等。1938年10月20日,日本占据广州之后,强据《塔光》社,冒名出版刊物,遭到唾弃,刊物遂受影响停刊。共出四期,中山图书馆文献部藏有创刊号及第二、四期。北京大学图书馆存1-4期。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标记为No.1(民国25年[1936])—No.4(民国26年8月20日[1937,8,20])。

5. 《怀圣》

月报。创刊于1948年7月5日,由中国回教协会广州分会光塔寺(怀圣寺)文化部主办。总编辑为熊振宗,社址在光塔路56号。开辟有教义讲座、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史、世界伊斯兰介绍、各地伊斯兰动态、文艺、家庭与卫生、学术园地、伊斯兰圣地游记、教义问答、消息、通讯、经文译解等栏目。本刊是其他各刊因抗战、经费、人员流动等各种原因相继停办以后广州仅存的出版物,目的是阐扬教义,扩大宣传,延续办刊传统。由于熊振宗是爱资哈尔大学教法学专业硕士毕业生,具有扎实的阿拉伯语基础和丰富的教义学、教法学知识,与国内外学术界沟通广泛,因而该刊登载了一些反应国外伊斯兰教情况和国内知名学者的文章,执笔者主要有郑师许、陈克礼、岑家悟、罗香林、熊振宗、马肇选、马景廉等。共出12期,中山图书馆文献部现藏有第二、三、四、五、十、十二号。

6. 创办于1925年的《晨光》周刊和1948年的《中国回教协

^①限于资料,《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误为文化月刊,其实是非连续性出版物,有关本刊的创办时间也有错误。

会广州分会会刊》，中山图书馆文献部没有收藏。

二、办刊宗旨及服务对象

这些刊物的主办者主要是广州以回族为主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针对当时伊斯兰教衰微不振，回族大多不懂教义，信仰滑坡；外人猜测，肆意曲解；国势飘摇，民心离散的状况，力图阐扬教义，振奋民心，挽救教门，为增加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和理解而办。其作者群和读者群基本上都是居住在广州的阿訇、社会贤达、文人学者、在校学生等，多数都是近代以来才入居广州者，且以外地人暂居者较多。他们深受全国各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感召，在外地来粤开学阿訇的倡议下，联合各清真寺乡老和学董中的有识之士，走文化救族、振奋民心及复兴宗教之路。这一特点在各刊物中都有反映。

《塔光》发刊词为：“溯我教传入中国，业有悠久历史，徒以闭关自守，不尚宣传。教外人难明奥义，咸以神秘目我，传闻悬揣，误会滋多；而好事者又推波助澜，以讹传讹。于是谤毁杂茁，数见不鲜。近数年来所发生之侮教案，其动机半由于此，言之能不痛心哉。敝社同仁，有鉴及斯，乃不揣鄙陋，创组是刊……纯以阐扬我教真理为宗旨，以期稍尽教徒天职……”

《穆民》的征文规约中称“本报以阐扬教理，振兴宗教，提倡实业，研究学术，促进建设，指导穆民爱国爱教为宗旨”。

《天方学理月刊》宗旨为“用显浅和有趣的文字，纠正教俗相沿的错误，以科学理解表扬真理，使阅者咸具教理卓识，提倡教育和传达消息，促进穆民信仰的思想”。

刊物的发行范围主要在广州、肇庆、佛山等地，此外还辐射到香港和南洋地区，以及北京、上海、昆明、重庆等办有穆斯林民间刊物的地方。广州穆斯林免费索取，外地来函付邮资即寄。从编辑来往信函看，其占有的读者量虽不算大，但流布的范围还是相当广泛，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有些外地读者也献言献策，关心刊物的

生存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报纸还与广州市政府电台广播形成良性互动,每周电台都邀请精通教义的知名人士去做专题讲座,之后又发表到《怀圣》上,这一做法对消除非穆斯林的误解,促进各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避免了侮教案的发生。因而可以说电台的听众也是读者的一部分。

三、文本内容分类及简评

虽然各刊物内容不尽一致,但就其主要栏目,可以将文本内容大致概括为以下几种:

1. 伊斯兰教义方面:宣传教义是各个刊物的重点,也是针对性比较强的栏目,通过介绍伊斯兰教的信仰总纲和宗教礼仪、活动、实践,以期达到在回族中普及伊斯兰教知识的目的。因而这一方面文章的执笔者往往是清真寺的伊玛目或懂得教义学、教学法的人。他们引经据典,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讲解教义,其实类似于清真寺聚礼时阿訇的演说词,是教人行善,止人作恶,传播教义的书面表达。因此还有人专门记录阿訇的“卧尔兹”,^①经过加工整理发表在刊物上。

作者中,马瑞图、刘传根、山国庆、马达吾、熊振宗、易司马仪、达新吾、穆吉瑞、王钧璞、金法舒、马云从、杨瑞生、杨竹平、杨汉光等可以肯定是阿訇,其他诸位一般有过念经的背景,他们已经对比较细致的教法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有些人对一神教系列各大宗教也有比较研究,反映了当时外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日增,他们利用经济优势和广州已有的传媒进行宣传,可能对伊斯兰教教义学方面多有误解,为了澄清真相,释疑解惑,许多回族学人也开始对这些事件进行回应。

2. 论坛栏目及其主题:这一栏目是各个报刊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反映当时穆斯林社会及宗教信仰状况的真实写照。内容涉及

^①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劝告”“告诫”,是懂得伊斯兰教教义学的人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在宗教节日或宗教集会中的演讲词,主要内容是劝善戒恶。

婚姻家庭、宗教教育、文化宣传、刊物使命、妇女解放、风俗改良、抗日救国等多个方面,涉猎面十分宽泛。重点在于讨论如何挽救伊斯兰教信仰,兴办教育,改革陋习,扩大宣传,激发广大穆斯林青年爱国爱教的热情,关注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发展,注重对伊斯兰教的学习。同时报刊还关注时事,思考当时的社会问题并联系广州穆斯林的现实生活。文章既有理论方面的关注,也有可操作性的方法探讨。回溯各刊出版之时,正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际,呼吁宣传抗日,凝聚民心,唤醒民众是这些刊物的一个共同特征。也有些文章偏重于介绍伊斯兰教历史,宣传伊斯兰文明,探讨中阿关系,不失为很好的学术文章。

3. 翻译栏目:主要由懂得阿拉伯语的作者翻译伊斯兰教典籍、教义学著作及圣训。当时《古兰经》虽有清代马复初的《宝命真经直解》五卷残本问世,但刊行有限,流布不广,许多回族文化人士都参阅散见于明末清初以儒诠经学派作品中的零星翻译。20世纪30年代虽然有铁铮、姬觉弥、王静斋的翻译本问世,一方面前两种本子为汉族人由日文和英文转译过来,不易在民间获得认可。此外当时刊印经书流通渠道不通,都没有在民间形成大的影响,广州地区虽然有1929年番禺白铭庵遗著《汉译古罗伽尼駭听真经》,抗战前也有木板印刷《哈庭》,^①但因节选的经文过于短小,不能起到全面了解经文的作用,因而广州穆斯林知识分子非常重视经典的翻译。对发生在阿拉伯半岛上的瓦哈比运动也有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境外伊斯兰思潮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及他们的认识。鉴于其对瓦哈比运动持否定态度,可以推断当时广州穆斯林完全遵从大伊玛目艾布·哈尼法的教法,教派隶属上基本上是格底目(老派),延续着广州开天古教的宗教传统,在思想意识方面对发生在伊斯兰教圣地的宗教革新运动并不认同;对圣训的翻译也格外重视,各刊中有

①以上两种翻译都是《古兰经》章节的节选本,一般选取短小易记,穆斯林日常生活中念诵的章节。

零星圣训,作为普及教育,劝勉穆民的金玉良言。说明当时穆斯林社会急需教义教规的知识和规范,借助伊斯兰教的两大法律源泉《古兰经》和圣训教导普通大众的愿望非常强烈。

4. 时事:这一部分内容比较零乱,有些文章内容与论坛栏目有重复,但主要采用幽默诙谐的笔调,借古讽今,针砭时弊。虽然没有论坛栏目一言直中要害之痛切,但读来使人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也是从不同角度了解广东伊斯兰教的窗口,栏目的设置有利于读者扩大知识面,培养后备作者队伍,其“革俗”部分也是对其他栏目内容的补充。在辑录分类时还包括了各刊的杂俎、革俗、东鳞西爪等内容。

5. 特载:各个报刊基本上都选取一些当时反映比较强烈和敏感的问题专门约稿,例如1932年2月份出版的《穆民》(贵月号)就是借穆斯林斋月之际,专门就封斋开斋等有关斋戒问题集中刊出,便于穆斯林学习和实践。本刊物就有七篇文章涉及开斋节的礼仪、侯坤(法律)。这些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利用专辑的形式出版便于信教群众查阅和学习。

1931年8、9期合刊的《穆民》(婚丧专号)更是特色鲜明,专门讨论婚姻和丧葬,其实都属于伊斯兰教法学研究的范围,目的是提供合法婚姻的教法解释,从婚龄、聘礼、仪式、卫生、夫妻责任、离婚谈到当时广东的大操大办、奢侈成风的婚姻陋俗及其对穆斯林生活形成的影响,内容详尽。

丧葬问题中,从料理死者到伊斯兰教的速葬、薄葬、土葬、丧制、游坟、纪念亡人等方面作了详细说明,既有针对当时许多穆斯林子弟放弃了伊斯兰教信仰,不懂得具体丧葬过程和方法,因而有特意传播有关知识的良苦用心,同时也是对其他非穆斯林群众的宣传。

《天方学理月刊》第十五期(回耶辩真专号)专门针对基督教媒体对伊斯兰教的曲解进行辨析,详述了伊斯兰教对犹太教、基

督教的态度,分析了产生误会的缘由,批驳了原罪说,介绍了伊斯兰教关于前定和个人意志自由之间的关系,并发出了两种宗教对话的声音。这种辩论有时形成笔战,穆斯林往往以上述几种刊物作为文化阵地,对基督教媒体的言论进行笔伐,可惜的是没有形成很好的学术讨论环境。

《穆士林》第十一期专门记录了《南华文艺》侮教案始末,并号召粤港穆斯林团体或清真寺团结一致,声援护教运动,同声谴责侮教事件,内容翔实,是研究侮教案不可多得的材料,其护教汇闻包括教案、电报、信箱、日记、社论等内容。

6. 鸟瞰及消息:详查几种文本报道了许多有价值的国内外消息及粤港地区穆斯林活动的情况,内容比较庞杂且数量大,尤其是有关清真寺办学、修建、宗教活动场所变迁、回教俱进会粤支部的组建和活动情况、各地穆斯林的来往、流动、清真寺举办的各项活动等,具有十分珍贵的资料价值,是研究民国时期广东穆斯林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某些对外界的报导,如《穆士林》刊载的《甘肃临潭县通讯》,虽然寥寥数语,但对当时发生在甘肃临潭县土司对当地回族的民族仇杀叙述清楚,成为了解这一事件真相不可多得的材料。对于揭开历史谜团,还历史以公允意义非凡。对国外的报导主要围绕伊斯兰国家发生的事件,很少述及其他国际政治,对伊斯兰教认同的价值取向很明显。《怀圣》刊登的《筹备怀圣同学会启事》《濠畔寺筹办濠光小学》《肇庆清真小学校近况》等文章对了解回族当时的民间办学情况及其成就很有帮助。

7. 其他:文艺、医学常识、笔记、来函照录、社务、布告等。由于各个刊物划分栏目的标准并不一致,因而有些文章很难进行确定的分类,足见其涉猎面之宽泛,尽管对有些内容的记载稍嫌简略,但寥寥数语仍对后人留下了可资参阅的资料。用文学的语言宣传伊斯兰教可以说是这一时代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对后来刊物的风格影响较大。民国以前回族知识分子一般只注重典籍的翻译和阐

释,忽视文学翻译和创作,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但发轫于民国以宗教内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伊斯兰教文本资源本土化的一大特征,联系近年来在中国文坛上比较活跃的张承志等人,我们似乎才能感受到这种本土化的价值和开创精神。有些文章利用充满激情的言辞,引证经训,号召广大穆斯林同胞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保家卫国,反映了穆斯林热爱祖国,关注整个中华民族前途,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爱国精神和国家意识。这种爱国热情有助于澄清历史上因统治阶级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而导致回汉两族隔膜甚至仇杀之真相,就此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很高的评价:“回族在中国历代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①鲁迅先生也说“每当历代世衰,回教徒必有动作”。^②此外还有纪念穆斯林文化名人的文章,几篇文章中多次纪念的吴事勤是一位汉族穆斯林,也是上述几种刊物的热情作者,发表了很多有见地的文章,他去世后很多笔友都写了悼念性的文章,不失为对作者作为文化使者功绩的肯定。纵观文艺类栏目,仅体裁就有诗歌、小说、随笔、散文、祝词等,风格多样,以适合不同读者的阅读兴趣。

四、文本的学术价值

中国穆斯林历来不太注重资料的记录和收集,广州虽然是穆斯林来华最早的地方,但有关唐宋元三朝先民的活动情况散见于正史、地方志及各种笔记文集中,完全由穆斯林辑录的资料几乎付之阙如。由于历史久远以及广州文化地理变迁之因,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碑铭、石刻、墓志等也遗失或遭到破坏,现在保存下来汇编出版的古籍资料中,有关唐宋元三朝的寥寥无几,对后人研

①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②《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究造成极大困难,只能按照田野调查做一推断。明末清初的回归学人在翻译经典,促进宗教本土化方面既有开创之功,也达到了历史的巅峰,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本资源,但主要内容是“以儒诠经”和有关教义学、苏非修持及宗教实践方面的学问,缺乏有分量的史学资料。在清代,一则受西北、西南回民起义的影响,满、汉统治阶级人为制造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不断,中国伊斯兰教实力遭受重创,资源遭到极大破坏;其次,清朝实行文字狱后民间对于出版事业谨小慎微。就伊斯兰教而言,乾隆时期(1781年)曾发生于广西的海富润事件^①,虽然几经周折得到妥善解决,但给民间造成很大恐慌,更加限制了经书的刊印和流传。

这种被动局面在民国时期获得很大改观,回族深受五四运动民主科学精神的影响,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也积极展开唤醒民众,激发宗教热情,复兴伊斯兰文化之路,一改历史传统中不对外宣传的封闭心理,兴办文化实体,出版期刊报纸,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珍贵文本,可以说开创了穆斯林“书写历史”的新纪元。上述七种文本资源在广东伊斯兰教的历史上无疑是空前的,它极大地丰富了广东通史和地方志中缺失的内容,为进一步研究许多具体问题提供了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较宏观的角度而言,大致有以下重要意义。

1. 能够多角度了解广东当时的民族关系、宗教互动及穆斯林的生活状况。诸如广州回、汉文人当时良好的交往关系,回应基督教传教士对伊斯兰教的反面宣传,反驳侮教案的肆意歪曲等。

2. 研究广州伊斯兰文化变迁的有益材料。文本中记录了大量文化变迁的内容,最典型的如婚姻方面,有异族通婚、奢侈风气、婚俗礼仪变迁等内容,便于做历史人类学的考察。通过对当时穆

^①海富润是崖州人,历史上属于广州府管辖,他缠上官司,自然会对整个广东穆斯林形成很大影响。参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3月第1版,第206页。

斯林在斋月、开斋节和宰牲节、圣纪、大人纪、开经等活动的记载，可以了解广东穆斯林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

3. 研究民国广东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第一手资料。

4. 了解民国时期回族文人心理和穆斯林社会状况的窗口。

5. 对研究中外关系史（尤其是我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文本反映的文人心态

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智力资源和中坚力量，在历史上扮演着民族代言人的角色。考察民国时代广州穆斯林学人，其中有回族，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他们既忧虑于教民宗教知识的匮乏，有被社会同化的危险；又担心于民族自觉意识的下降，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辗转难安，反映了穆斯林国家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增强。这种忧患意识是整个中华民族文人的共同心态。就广州穆斯林而言，他们还受到同期其他各地穆斯林学人进步思想的影响，表现出时代变革之际知识文人的文化先觉及互动，正是他们的先觉意识对社会形成启蒙和影响，进而造就了一批为国家、为宗教、为民族竭尽全力，鞠躬尽瘁的知识精英，成为民族心声的代言人，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穆斯林文人关注的焦点在于宗教的勃兴，以宗教启发民智，唤醒大众参与社会和生活事务。而宗教的复兴离不开教育，因而提倡教育成为他们的共识。无论是办刊物还是办学校，目的都是发展教育，宣传伊斯兰文化，消除民族隔阂，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理解和交流。这一点在民国时期广州穆斯林创办的刊物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具有明显的走文化救族道路的思想倾向。每期刊物消息栏报导最多的就是有关各地教育进展的状况，具有强烈的文人气息。

阿匄是广州这一时期文化宣传的核心和主力，他们以自己在各个清真寺的地位和作用，团结教民，并形成不同清真寺的互动。

据《塔光》第二期编后语记载,该刊物的出版承蒙濠畔寺陈秀芝阿訇、东营寺杨瑞生阿訇、南胜寺周善之阿訇、香港中华回教博爱社熊振宗阿訇、香港伊斯兰学校马达吾阿訇的热心赞助和募捐。同时这些人也是各个刊物的主笔。他们目光远大,作风务实,具有良好的汉文化功底和经学水平,这在广东伊斯兰教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为广东伊斯兰文化的保存、传播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也是阿訇身兼宗教师和文化人双重角色最为协调的时期。

考察近年来广州穆斯林族群出现多元化,生活多样化,行业逐步扩大,商业步入繁荣,新的移民群体中聚集了很多各个民族的文化知识阶层,他们必将成为新一代穆斯林的智力资源。总结民国时期穆斯林学人的成就和经验,为后来者提供借鉴,以期社会各界都能倾听作为一种文明持有者其知识精英的心声,便于更好地把握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脉动,创造外来工与定居者、民族与国家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良好互动,营造多元文化发展的和谐社会氛围,从而为国家的发展和多民族的团结进步作出各民族应有的贡献。

六、余论

除了明末清初兼通四教的回儒为释疑而附儒以求文化生存,在教义学领域传承下来的文本之外,中国穆斯林在很多时候并不重视资料建设,记录历史的足迹,给后辈留下可以追忆和复原历史的文本,这是一种遗憾。其中虽然不乏过去为保存信仰传承而拒绝汉文化的自我封闭意识,然而长期的商业和农耕生活,造成了我们对文化的轻视,无论是伊斯兰文化还是汉文化,概莫能外。历史上学富五车,开大学,讲大经的阿訇,只是以口传的形式将自己的“尔林”接续给了学生。因之,一个阿訇的逝去,或许会造成某一本经典讲授的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没有留下可资借鉴的书写材料。后人应该感谢民国时期广州的穆斯林文人,在华南这一块广袤的土地上,我们竟然还能咀嚼到当时如此典雅的文